

# 宋代文章学的成立：从黄庭坚到吕祖谦<sup>\*</sup>

李 由

**内容提要** 在宋代文章学成立的历史进程中，“黄庭坚—吕本中—吕祖谦”的传承谱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凸显了以师友传承为特点的文章学教育机制对宋代文章学发展的特殊意义。从黄庭坚到吕祖谦，他们一方面以道本文末观对创作主体提出要求，另一方面肯定作文工夫的重要性，确立法度在文章创作中的地位，对文法的探讨日益自觉。遂形成以唐宋大家和先秦两汉之文为范本，以编选、评点为方法，涵盖字法、句法、章法、篇法等多层面的文章学范式，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文章学的发展。

**关键词** 黄庭坚 吕本中 吕祖谦 宋代文章学

北宋中期以后，随着古文革新的成功以及科举取士转向重视文章<sup>①</sup>，文章写作愈发重要。如何让士子们便捷地掌握一套实用的作文方法，成为宋代文章学<sup>②</sup>发展的主题，揣摩、阐释、总结、传授文章写作之法渐成风气，专论文章的独立著作终以形成，有学者遂以此作为中国古代文章学成立的标志，提出“南宋成立说”<sup>③</sup>。本文不拟涉入中国文章学成立时期的论争，只想深入到宋代文章学发展的历史细节中去，探索宋代文章学自身酝酿、发展、成熟成立的历史过程，及其学术内部的发展传衍机制。具体通过对“黄庭坚—吕本中—吕祖谦”这一传承谱系的钩沉索隐，揭示以师友传承为特点的文章学教育机制在宋代文章学演进中的作用，思考这一传承谱系的历史意义与影响，以增进对宋代文章学特色与价值的理解。

## 一 黄庭坚：法度论的凸显

无论是吕本中对黄庭坚诗学的传承，还是吕祖谦对吕本中思想学术的传承，学界皆已取得了相

---

<sup>\*</sup>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宋元文章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研究”（项目编号 18CZW026）阶段性成果。

<sup>①</sup> 学界一般以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为古文革新成功的标志性事件，同时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大家的涌现，使得北宋散文创作达到高峰，为文章学的发展提供了创作基础。而仁宗朝以来策、论在科举取士中地位越来越重要，熙宁变法更罢诗赋改用经义、论、策取士，元祐以后虽然一度分诗赋、经义取士，但论、策依然共存于两种取士方法中。

<sup>②</sup> 这里所说的文章学是与诗学、词学等相对的、以散文为主兼及辞赋骈文等文体的理论批评之学。

<sup>③</sup> 参见王水照、慈波《宋代：中国文章学的成立》（《复旦学报》2009年第2期）、祝尚书《论中国文章学正式成立的时限：南宋孝宗朝》（《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而吴承学等学者则对成立时间有异议，参见吴承学《中国文章学成立与古文之学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胡大雷《“文笔之辨”与中国文章学的成立——“文话”出现于隋唐考辨》（《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2期）。这一争论涉及对“文章学”内涵、“成立”标准等问题的理解差异，尚可继续讨论。

当的共识，而三者之间一脉相承的文章学传承似较为隐秘，尚未被留意。而无论是从理论成就上看，还是从在当时的代表性、后世的影响力上看，三人都是对宋代文章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性人物。以下将按照时代先后，从学缘上的联系、理论上的承继以及在各个时段的影响等方面对三人分而述之。

北宋中期因古文革新以及科举取士重文，师友间论文的风气盛行一时，其中尤以苏门为代表。苏轼、苏辙、黄庭坚、陈师道、张耒、秦观、李廌、唐庚等人留下了对文法的讨论，而从今存文献看，黄庭坚是北宋中期在文章学上成就最为突出、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sup>①</sup>。其文章学虽受苏轼等人的启发，却能深思自得。既是其对诗文创作长期思考的自然结果，也与元祐年间传授“四洪”、秦觏、王直方等人科举程文作法的需要有关<sup>②</sup>。

黄庭坚文章学的大旨在于根本论和法度论。根本论是以心性德行的修养作为根本，主张通过师经法圣、反求己身、力行所闻等途径来治心养性、树立根本。如其指导秦觏作文“力行所闻，是此物之根本，冀少章深根固蒂，令此枝叶畅茂也。”<sup>③</sup>指导洪刍“孝友忠信，是此物之根本，极当加意养以敦厚醇粹，使根深蒂固，然后枝叶茂尔。”<sup>④</sup>“根本论”可以看作黄庭坚对作者品格修养的规范性要求。而值得注意的是，黄庭坚以文为儒者“末事”，但未将其排除出“儒者之事”，并肯定了在作文上用功的重要性，如云“文章最为儒者末事，然既学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sup>⑤</sup>“以文为末”的同时，他“以文为技”，认为“作文字须摹古人，百工之技亦无有不法而成者”<sup>⑥</sup>，将法度看作作品的内在属性、创作的必要条件，先要有法度、有规矩，最终达到不为规矩所缚，“不烦绳削而自合”<sup>⑦</sup>“领略古法生新奇”<sup>⑧</sup>的境界。这一观念成为吕本中“活法”说的先声，也成为中国艺术思想史上典型的法度辨证观，即初由法度而入，终不拘于法，纵横变化而合乎法。

在黄庭坚那里，“法度”既是一种文体规范，也是具体的行文技法和规则，二者又共同体现在典范作家的作品即“法式”之中。他文体观念很强，认同王安石“评文章，常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sup>⑨</sup>的做法，主张“诗文各有体”<sup>⑩</sup>，强调文体的体式规范。而其“锦机”之喻，则糅合了文体规范和技法规则。如云“若欲作楚词追配古人，直须熟读楚词，观古人用意曲折处讲学之，然后下笔。譬如巧女文绣妙一世，若欲作锦，必得锦机，乃能成锦尔。”<sup>⑪</sup>锦机既是制作工具，又起到制作模范的作用，并包含着一套制作工艺和技法。具体到文学创作中，某一文体的经典作品形成了一组范本，构成了一种创作范式，既包括体式规范，也包括具体的立意布置等行文技法即“用意曲折”，规范着、指引着后人的创作实践。

① 乐进进《论黄庭坚的文法与南宋文章学理论的兴起》（《文艺理论研究》2022年第1期）指出黄庭坚的作文理论对南宋文章学的发展有深刻影响。

② 参见拙文《元祐科场与黄庭坚的文章学》，《新宋学》第5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6—226页。

③ 《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二七《书秦觏诗卷后》，黄庭坚著，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册，第723页。

④ 《宋黄文节公全集·外集》卷二一《与洪驹父》，《黄庭坚全集》，第3册，第1365页。

⑤ 《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一八《答洪驹父书》，《黄庭坚全集》，第2册，第475页。

⑥ 《宋黄文节公全集·别集》卷一一《论作诗文》，《黄庭坚全集》，第3册，第1684页。

⑦ 《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一八《与王观复书》，《黄庭坚全集》，第2册，第470页。

⑧ 《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四《次韵子瞻和子由观韩幹马因论伯时画天马》，《黄庭坚全集》，第1册，第82页。

⑨ 《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二五《书王元之竹楼记后》，《黄庭坚全集》，第2册，第660页。

⑩ 陈师道《后山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上册，第303页。

⑪ 《宋黄文节公全集·外集》卷二一《与王立之》，《黄庭坚全集》，第3册，第1371页。

法度的地位既已确立，又该如何获得法度呢？为此黄庭坚提出“读”“讲”并重的方法。所谓“读”，即指出师法典范，令学者熟读范本。初步提出以先秦西汉、唐宋大家散文为典范的思想，主张“熟读《左传》《国语》《楚词》、庄周、韩非”<sup>①</sup>，“勤董、贾、刘向诸文字。学作论议文字，更取苏明允文字读之”<sup>②</sup>，“以韩文为法”<sup>③</sup>，观法度于“左氏、庄周、董仲舒、司马迁、相如、刘向、扬雄、韩愈、柳宗元，及今世欧阳修、曾巩、苏轼、秦观”<sup>④</sup>等等。这一体系既继承了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先驱对经典的指认，又及时总结了唐宋古文革新的创作成就，突出了唐宋经典作家的地位，后世的“唐宋八大家”体系在此已初具规模。

所谓“讲”，即“法度粲然，可讲而学也”<sup>⑤</sup>，既要“读得通贯”，又要“因人讲之”<sup>⑥</sup>，在熟读的基础上，从范本中提取具体的规则和技法。为此他先是有意识地吸收前人对文法理论的探索，如云“刘勰《文心雕龙》、刘子玄《史通》，此两书曾读否？所论虽未极高，然讥弹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sup>⑦</sup>进而总结出一些作文的规则和技法，如取法韩文杜诗造语用字方法的“点铁成金”说，重视文章总体的立意布局结构，即所谓“步骤”“致意曲折处”“规摹及所总览笼络”等等。为了更便利地讨论这些法度，他采用了文本细读的方式，结合具体文本分析法度。如让潘大临“读司马迁《孟子》《伯夷》《荀卿传》、韩愈《原道》，求其故，因来示教”<sup>⑧</sup>。范温《潜溪诗眼》载：

山谷言，文章必谨布置，每见后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原道》以仁义立意，而道德从之，故老子舍仁义，则非所谓道德。继叙异端之汨正。继叙古之圣人不得不用仁义也如此，继叙佛老之舍仁义则不足以治天下也如彼，反复皆数叠，而复结之以先王之教，终之以人其人火其书，必以是禁止，而后可以行仁义，于是乎成篇。（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〇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册，第63—64页）

从范温的文本分析看，黄庭坚在教导后学时，注重文章的立意以及整体的结构安排，包括论述的先后次第、起结铺叙、反复论证等等。而《史记》中的《孟子荀卿列传》《伯夷列传》也向来被认为在立意布局上有精妙之处。如蔡世远评《孟子荀卿列传》“文之抑扬开阖，备尽其致”<sup>⑨</sup>，茅坤评《伯夷列传》“势极曲折，词转微，若断若续，超玄入妙”<sup>⑩</sup>等等。黄庭坚也屡屡提到“关键”二字，看重行文的抑扬开合、首尾照应。如“论则须令有关键”<sup>⑪</sup>，“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始终关键，有开有阖”<sup>⑫</sup>，评价陈师道作文“深知古人之关键，其论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sup>⑬</sup>等等。

总而言之，黄庭坚的“根本论”继承发展了唐宋古文革新的文道观，是对创作主体思想行为的规范性要求。“法度论”的强调则在客观上为宋代文章学走上自觉探索文章法度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① 黄磬《山谷年谱》卷二四引黄庭坚《跋自书枯木道士赋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13册，第903页。

② 《宋黄文节公全集·外集》卷二一《与洪驹父》，《黄庭坚全集》，第3册，第1366页。

③ 《宋黄文节公全集·别集》卷一九《与斌老书》，《黄庭坚全集》，第3册，第1892页。

④⑤ 《宋黄文节公全集·别集》卷二《杨子建通神论序》，《黄庭坚全集》，第3册，第1487页。

⑥ 《宋黄文节公全集·外集》卷二一《与赵伯充》，《黄庭坚全集》，第3册，第1371页。

⑦ 《宋黄文节公全集·外集》卷二一《与王立之》，《黄庭坚全集》，第3册，第1370页。

⑧ 《宋黄文节公全集·续集》卷一《与潘邠老》，《黄庭坚全集》，第3册，第1908页。

⑨ 蔡世远《古文雅正》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6册，第16页。

⑩ 茅坤《史记钞》卷三三，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41页。

⑪ 《宋黄文节公全集·续集》卷四《答石长卿》，《黄庭坚全集》，第4册，第2013页。

⑫ 《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一八《答洪驹父书》，《黄庭坚全集》，第2册，第474页。

⑬ 《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一八《答王子飞书》，《黄庭坚全集》，第2册，第467页。

“读”“讲”并重、以文本细读的方式求法示法，提供了探索的方法和工具，已具有文章评点的雏形<sup>①</sup>；确立先秦西汉、唐宋大家的范本体系，揭示文章立意、谋篇、布局、行文照应等法度，则使得黄庭坚的文章学思想比前贤更为深入。不难发现，黄庭坚的文章学与诗学多有交汇融通之处，如“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sup>②</sup>等，多诗文同论。而范温继承黄庭坚的思想，提出律诗“亦是一片文章”（《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七，第1册，第43页），以文章的命意布置之法来阐释诗法。可见黄庭坚及其后学有诗法文法互鉴互渗的倾向，而其中又有分流的趋势。诗文各有其体，黄庭坚对洪刍说“甚恨不得相见，极论诗与文章之善病。”称其“寄诗语意老重……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绳墨耳。可更熟读司马子长、韩退之文章”<sup>③</sup>，正是诗文分论。他所树立的典范体系，揭示的文章命意布局、抑扬关键之法等，较偏于文章学。而他对诗法的体悟比文法更为深刻，创作成就也以诗歌为高，对此他也颇有自知之明，称“作文从来少功，未得所谓”<sup>④</sup>，“绍圣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旧所作读之，皆可笑。绍圣以后，始知作文章，但已老病，惰懒不能下笔也”<sup>⑤</sup>。这些话都出现在诗文分论的语境中，所谓“作文”“作文章”都在谈狭义的文章，而不是诗歌。这也说明，在北宋中期，与较为发达的诗学相比，宋代文章学仍然处在酝酿阶段。黄庭坚的文章学相比于欧阳修“看多、做多、商量多”（《后山诗话》，上册，第305页）以及苏轼熟读《檀弓》等说法更加细致、具体，但仍有待发展。

## 二 吕本中：承前启后的宋代文章学史意义

关于吕本中对黄庭坚及其后学诗论上的继承与发扬，前贤论之详矣，亦有学者指出吕本中在宋代诗学史上有承前启后的地位<sup>⑥</sup>。如果我们将视角转移到文章学上，会发现他同样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两宋之际，他一方面广泛总结、继承以黄庭坚为代表的北宋文章学，将之南传，又在确立文章典范体系、阐释文章法度等方面深化拓展，启迪来者。这些成果集中在其家塾训课教材《童蒙训》中<sup>⑦</sup>。此书约成于绍兴初<sup>⑧</sup>，在绍兴十八年（1148）以前即已板行<sup>⑨</sup>，在高宗、孝宗朝流传广泛，成为一些家

① 黄庭坚对诗语法度的阐释与后世评点颇为相似。他自称读杜诗时，“尝欲随欣然会意处，笺以数语”（《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一六《大雅堂记》，第2册，第437页），这应不只是对语意的笺释，而是揭示诗之妙处。唐庚《送王观复序》提到黄庭坚“书柳子厚效渊明古体诗十数解示”于王观复，令其知“文章低昂疏密之节”（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三〇〇九，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册，第338页），似是结合具体文本剖析、展示文法。

②③⑤ 《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一八《答洪驹父书》，《黄庭坚全集》，第2册，第474页。

④ 《宋黄文节公全集·续集》卷一《与潘邠老》，第3册，第1908页。

⑥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宋金元文学批评史》第二编第二章《南宋初期的江西诗论——吕本中和陈与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上册，第244—245页。

⑦ 论诗文的内容不见于今传本，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做了辑佚，陈尚君进行了补遗纠误（《宋诗话辑佚》匡补，《中国诗学》第四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这些内容何时遗失，为何遗失，尚无定论。不过成书于宋末的《诗人玉屑》等仍引用相关内容，可见是书原本在整个南宋应有流传。

⑧ 书中吕本中称其父吕好问为东莱公，吕好问在建炎三年（1129）冬祀进封东莱郡侯。又称徽宗为上皇，鉴于徽宗绍兴五年（1135）去世，宋廷绍兴七年（1137）得知其去世的消息，《童蒙训》成书似应在此之前。

⑨ 《苕溪渔隐丛话》有“《童蒙训》已锓板行世”（《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二，第160页），其前集作于绍兴十八年，已引用《童蒙训》。

塾、官学的教材<sup>①</sup>。南宋文章学著作多曾予以参考，尤其对吕祖谦颇有影响。本中虽未亲炙黄庭坚，但他与山谷后学或有亲缘关系（如表叔范温），或有学缘关系（如徐俯、饶节、汪革等），能够得闻那些最初只在师友小圈子中口耳相传的文章学思想，如《童蒙训》中引用的欧阳修、苏洵、苏轼、黄庭坚、张耒、徐俯、潘大临等人的论文之语多是此类。而崇宁二年（1103）吕本中在宿州与汪革、饶节、黎确、吕揆中等会课，“每旬作杂文一篇，四六表启一篇，古律诗一篇”<sup>②</sup>，可见除了诗歌外，文章也是他们创作和讨论的对象。

吕本中对黄庭坚等北宋名家文章学思想的承继主要体现在：一，将“圣学工夫”与“作文工夫”融会并存，肯定作文用功的合法性；二，提出“工夫一悟入”说，指示学文的具体路径；三，提出以先秦西汉为宗而从唐宋大家入门的范本学习次序；四，提炼更为细致的文法，并超越具体法度而提出“活法”说。

作为道家，吕本中较之黄庭坚更能深切体会到道学内部对文学创作的排斥态度。如有诗题云：“往年与关止叔相别甬上，止叔见勉学道甚勤，且曰无为专事文字间也。及今五年矣，尚未有所就，因作诗见志，且以自警也。”<sup>③</sup>其中可见程颐“作文害道”说的阴影。在程颐看来，作文不用力则不工，用力则妨害为学工夫，因此他认为作文会夺志，进而害道。他还将学问分为“儒者之学”“文章之学”“训诂之学”<sup>④</sup>，有将“文章之学”与“儒者之学”割裂的倾向。作为回应，吕本中一方面将作文看作万事之一，从格物致知的理路看，万事皆当理会<sup>⑤</sup>，从而肯定了作文的合法性。《童蒙训》论学多取周、程等，论文则多取苏、黄等，可见他将“圣学工夫”与“作文工夫”一并视为士人教育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从“万物一理”的观念出发，吕本中认为“圣学工夫”“作文工夫”虽目标不同，但方法路径一致，都须“用力以有得”<sup>⑥</sup>，即经历由工夫而悟入的过程。所谓“圣学工夫”，即在求为圣人、希圣、内圣方面下工夫，通过在日用行事间、在格物致知上勤下工夫，以圣贤为标准，修身践行，不断含蓄积累而终至悟入。学文也“必要悟入处，悟入必自工夫中来”<sup>⑦</sup>，从而肯定了“作文工夫”的必要性。当然，在文道关系上，吕本中以“圣学”为本，以“作文”为余事，勉励弟子“所要在守节”“余事及文章”<sup>⑧</sup>。这与黄庭坚的“根本论”有相似之处，而黄庭坚亦有“圣处工夫”<sup>⑨</sup>“道应无芥蒂，学要尽工夫”<sup>⑩</sup>等说法，与之相比，吕本中的“圣学工夫”条目更细致，内容也更具有洛学的色彩。

在学文方法上，吕本中的“工夫一悟入”说将神秘主观的个人体验（悟入）落到切实可行的工夫

① 隆兴元年（1163）进士丘密（1135—1208）就使用《童蒙训》作为家塾教材，长沙郡学、龙溪学曾刻印此书。南宋训蒙书如刘清之《戒子通录》、朱熹《小学集注》、刘荀《明本释》、袁采《袁氏世范》等皆受《童蒙训》的影响，兹不具论。

② 吕本中《东莱吕紫微师友杂志》，《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629册，第2页。

③ 吕本中著，祝尚书笺注《吕本中诗集笺注》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册，第327页。

④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遗书》卷一八，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册，第187页。

⑤ 吕本中《东莱吕紫微师友杂志》载范温语“作文章以法前人，又不可自屈沉也。万事不废，随事观理，他日自须脱然度越诸子。近见先生讥人博学，而学者废书不观，反为害事”（《东莱吕紫微师友杂志》，《丛书集成初编》，第629册，第9页），吕本中也认同文为万事之一的看法。

⑥ 吕本中《紫微杂说》，《丛书集成初编》，第629册，第10页。

⑦ 吕本中《童蒙训》，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0年版，下册，第594页。本文所引《童蒙训》如无特别说明，均据此本。

⑧ 《吕本中诗集笺注》卷九《叔度季明学问甚勤而求于余甚重其将必有所成也因作两诗寄之》，第2册，第627—629页。

⑨ 《宋黄文节公全集·外集》卷九《次韵郭右曹》，《黄庭坚全集》，第2册，第1078页。

⑩ 《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六《再次韵杨明叔》，《黄庭坚全集》，第1册，第126页。

上,相信通过不断地工夫,终究可以悟到属于自己的创作道路。从此说出发,他在继承黄庭坚等人文章学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作文工夫”、作文法度。首先,他继续黄庭坚诗文分论、读讲结合的思路,提出学文、学诗要熟读熟考不同的典范“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更考古人用意下句处。学诗须熟看老杜、苏、黄,亦先见体式,然后遍考他诗,自然工夫度越过人。”(《童蒙训》,第603页)主张从韩、柳、欧、苏入门把握文章体式,继而宗法先秦西汉文,遍考其用意下句之法,如云“文章大要须以西汉为宗”,“但把秦汉以前文字熟读,自然滔滔地流”(《童蒙训》,第605页)。主张师法《论语》《孟子》《礼记》《左传》等经书,参考《孙子》《列子》《庄子》《韩非子》等子书。尤其看重《论语》《礼记》简淡不厌,《孟子》议论抑扬反复,《左传》叙事有法、语有尽而意无穷,这些概括颇有眼光。至于西汉,他认为“议论文字,须以董仲舒、刘向为主,《礼记》《周礼》及《新序》《说苑》之类,皆当贯串熟考,则做一日便有一日工夫”(《童蒙训》,第603页)。唐宋诸家中,“韩、柳、欧、苏”中的“苏”一方面可理解为苏轼,因为吕本中尤其推崇苏轼文章,认为“自古以来语文章之妙,广备众体,出奇无穷者,唯东坡一人”(《童蒙训》,第604页),最应取法;另一方面似亦不妨理解为三苏,因为他也说“读三苏进策涵养吾气。他日下笔自然文字滂沛,无吝吝处。”(《童蒙训》,第605页)他还主张学习曾巩的文章“曾子固文章纤余委曲,说尽事情,加之字字有法度,无遗憾矣。”(《童蒙训》,第601页)这肯定了先秦西汉经典作家以及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等唐宋七家的文章经典地位。相比于黄庭坚,吕本中的范本体体系更为具体,亦从范本的法度规矩是否容易把握来确定学习的先后次序。如云“韩退之文浑大广远难窥测,柳子厚文分明见规模次第,初学者当先学柳文,后熟读韩文,则工夫自见。”(《童蒙训》,第602页)

在指示范本后,吕本中继承黄庭坚结合具体文本讲求法度的思想,通过文本细读,进一步提炼出行文的抑扬反复、纤余委曲,布局上的首尾相应、有本末次第等。如论《孟子》、韩愈、曾巩之文:“《孟子》中《百里奚自鬻于秦》一章;与韩退之论思元宾而不见,见元宾之所与者,犹吾元宾也;及曾子固《答李泌书》,最见抑扬反复处,如此等类宜皆详读。”(《童蒙训》,第601页)这三篇文字皆通过行文上的抑扬反复,阐明道理,抒发情意。布局上,他称赞秦观策论“有首有尾,元无一言乱说”(《童蒙训》,第601页),讲究章法布局、本末次第、首尾相应。这些分析明显受到黄庭坚法度论的影响。《童蒙训》即有黄庭坚之语“先立大意;长篇须曲折三致意,乃能成章。”(《童蒙训》,第595页)而本中弟子汪应辰则记载:

居仁吕公云,秦少游应制科,问东坡文字科纽,坡云:但如公《上吕申公书》足矣。故少游五十篇只用一格,前辈如黄鲁直、陈无己皆极口称道之。后来读书,初不知其为奇也。吕丈所取者,盖以文章之工,固不待言;而尤可为后人楷模者,盖篇篇皆有首尾,无一字乱说,如人相见,接引应对茶汤之类,自有次序,不可或先或后也。(马端临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二三七,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册,第6450页)

黄庭坚在写给范温的诗中说“少游五十策,其言明且清。笔墨深关键,开阖见日星。陈友评斯文,如钟磬鼓笙。”<sup>①</sup>吕本中的观点当本于此诗。而范温正是吕本中的表叔,二人颇有交游,《潜溪诗眼》也有黄庭坚以《原道》传授文章立意布置之法的记载,吕本中这方面的文章学思想可能受其影响。

除了这些宏观的“文字体式”外,吕本中还在微观的字法、句法方面有所推进。虽然《童蒙训》关于诗歌炼字炼句的表述更多,但这种重视字法、句法的思想一样体现在文章学中。如其接续陆机“警策”说“陆士衡《文赋》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论也。文章无警策则不足

<sup>①</sup> 《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三《晚泊长沙示秦处度范元实用寄明略和父韵五首》其五,《黄庭坚全集》,第1册,第70页。

以传世，盖不能竦动世人。……老杜诗云‘语不惊人死不休。’所谓惊人语，即警策也。”（《童蒙训》，第587页）不管是诗歌还是文章，都应当有这种能够“惊人”的警策句。他崇尚行文简该，讲究“省字”“省句”之法，引用刘知几《史通·叙事》“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sup>①</sup>的说法，倡导一种简淡、简古的文风。更以《礼记·檀弓》作为用字简该、叙事简淡的典范，认为《左传》有不及之处“《檀弓》与《左氏》纪太子申生事详略不同，读《左氏》然后知《檀弓》之高远也。”（《童蒙训》，第599页）而黄庭坚是较早鼓吹《礼记·檀弓》文法的，元祐三年（1088）他将自己刚从苏轼那里学到的为文秘诀分享给潘大临“子瞻论作文法，须熟读《檀弓》，大为妙论。”<sup>②</sup>山谷后学多与闻此论，吕本中自不难得知。而《童蒙训》在先唐诗文评著作中，单单引用《文赋》《文心雕龙》《史通》，也应受到黄庭坚的启迪。

《童蒙训》作为训课教材，故多讲具体的法度、切实的工夫，着眼于知规矩、入法度，而“活法”说则反映出吕本中对规矩与变化、定法与不定法之间辩证关系的认识。他引黄庭坚“文章切忌随人后”之语，说“不可循习陈言，只规摹旧作”（《童蒙训》，第596页），对黄庭坚辨证的法度论又有所发展。其“活法”说并非单言诗法，亦含文法，追求“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sup>③</sup>。

总而言之，作为故家大族子弟，吕本中凭借家世交游的优势，得以广泛接触师友间口耳相传的文章学论述，将讲习渐渍所得的黄庭坚等人的文章学思想加以汇总、发挥、南传，在宋代文章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韩澆说“渡江以来，晁詹事以道、吕舍人居仁，议论文章，字字皆是中原诸老一二百年酝酿相传而得者。”<sup>④</sup>楼昉则称吕本中“以正献长孙，逮事元祐遗老，与诸名胜游，渊源所渐者远。渡江转徙流落之余，中原文献与之俱南”<sup>⑤</sup>，都指出本中在中原文献南传上的功绩。所谓“中原文献”，除了典籍，也包括口耳相传的见闻、知识，文章学正是这样一种知识。南宋文章学类著作如《朱子语类·论文》、吕祖谦《古文关键》《丽泽文说》、张镃《仕学规范·作文》、王正德《余师录》、楼昉《崇古文诀》、真德秀《文章正宗》等皆明确引用《童蒙训》，认可其相关论述。尤其在汇编式文话《仕学规范·作文》《余师录》中，《童蒙训》的引用量较他书为多。而陈骥《文则》也极可能受《童蒙训》影响，其赞《檀弓》善于炼句，以世子申生事为例，说明《左传》不及《檀弓》叙事简该，与《童蒙训》的用例、观念完全一致，二者之间应有沿袭关系。反观两宋之际出现的《王直方诗话》《潜溪诗眼》《唐子西文录》《优古堂诗话》《珊瑚钩诗话》等等，文法杂于诗法中，内容较少，影响力也无法与《童蒙训》相比。

### 三 吕祖谦：宋代文章学成立期的代表

全祖望指出吕本中学术“上绍原明（吕希哲），下启伯恭（吕祖谦）”<sup>⑥</sup>，极有见地。在文章学上，也可以说吕本中上绍黄庭坚等人，下启吕祖谦。祖谦虽没有太多机会亲炙于伯祖本中，但无论其家学还是师学，都使得他可以承继本中之学。家学上，其父大器受学于本中，曾手抄《童蒙训》，家中保存了不少本中的著述。师承上，祖谦之师林之奇是本中高足，尤好古文，所编《观澜文集》能看出本

① 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六《叙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上册，第170页。

② 《宋黄文节公全集·别集》卷一九《与潘邠老帖》，第3册，第1887页。

③ 刘克庄《江西诗派序》引吕本中语，《全宋文》卷七五六七，第329册，第115页。

④ 韩澆著，孙菊园点校《涧泉日记》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⑤ 楼昉《童蒙训跋》，下册，国家图书馆藏宋绍定刻本。

⑥ 黄宗羲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三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册，第1234页。

中的影响。如其《观澜集前序》云“文乎文乎，澹泊而有遗味，发越而有遗音者，非活不能也。”<sup>①</sup>将“活”字用于论文，遗味、遗音之说与本中尚简淡含蓄、一唱三叹的文风相合。选文中，苏轼文最多，次为韩愈、柳宗元、曾巩、苏辙、司马光文，与本中所列典范有所重合。《童蒙训》提及的范文也多有入选，如《文赋》《答李翊书》《答李泂书》《三马赞并序》等。而《观澜文集》正是林之奇授与祖谦古文之学的教材。

《童蒙训》也是吕祖谦讲学、编书时的重要参考。论为官的内容曾被其单独抄出赠与弟子，论为学、修身的内容被《少仪外传》继承，论诗文的内容则为《丽泽集诗》《古文关键》《丽泽文说》等继承，此处专论文章学。国家图书馆藏宋刊本吕祖谦《续增历代奏议丽泽集文》后附《关键·总论看文字及作文法》一卷，内容是论看文、作文之法，是吕祖谦论文之语的辑录<sup>②</sup>。经考，其中十五条出自《童蒙训》，而现辑得的《童蒙训》佚文中专论文章的有二十二条，兼论诗文的有十四条<sup>③</sup>。可见，《童蒙训》是吕祖谦文章教学的重要参考。

在继承发扬本中文章学的基础上，吕祖谦通过编选范本集、创设古文评点法等方式，建构了较为完善、细致的文章学体系，提供了具有典范性的阐释文法的手段和工具。

首先从文道关系上看，南宋后期文学与道学从分裂对立走向融合共存，吕祖谦被认为是这一趋势的先导，“自元祐后，谈理者祖程，论文者宗苏，而理与文分为二。吕公病其然，思会融之”<sup>④</sup>。从学术渊源上看，这种思潮实发自吕本中，可能也受到黄庭坚的影响。黄庭坚虽列苏门学士，但希慕程颢、周敦颐的为人，其根本论重视心性修养，与北宋新儒学转向内省的思潮一致。南宋理学家黄震说“苏门与程子学术不同，其徒互相攻诋，独涪翁超然其间，无一语党同。”<sup>⑤</sup>而吕氏家学则以广大为心，吕希哲幼师欧阳修门人焦千之，又学于胡瑗、孙觉、邵雍、王安石，终归于程颐，本中不名一师，亦其家风。对于洛蜀党争，希哲、本中都有意弥合其矛盾。如本中记载希哲曾面斥讥笑程颐的欧阳修之侄孙朴，担心“苏程相失之后，门下士各有彼此”（《东莱吕紫微师友杂志》，第19页）。本中在南渡之际屡屡提及“消党与”<sup>⑥</sup>“消党论”<sup>⑦</sup>，有“以我广大心，尽使变齐鲁”<sup>⑧</sup>之意。其论文将“圣学工夫”与“作文工夫”融会并存，《童蒙训》既胪列二程、张载、邵雍、周敦颐等理学家的嘉言善行，又对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张耒、秦观等人的文章多所取则，正是吕祖谦所评价的“嵩、洛、关、辅诸儒之源流靡不讲，庆历、元祐群叟之本末靡不咨”<sup>⑨</sup>。

祖谦承其学，有意融会文学与理学，既讲究文章法度，主张“做过人工夫”<sup>⑩</sup>，又以圣学工夫为“根本”，如云“学者当务本，文艺亦所当为，盖无此非学也，然当以立本为先。”<sup>⑪</sup>所谓“根本”在于存养工夫，包括“持养、体察、主敬、致知、观过”<sup>⑫</sup>等等。其《读书记》讲述自己的读书生活，

① 《全宋文》卷四六〇六，第207册，第377页。

② 巩本栋《〈古文关键〉考论》，《文学遗产》2020年第5期。

③ 因《宋诗话辑佚》本多有割裂原文处，故此处统计与之略有差异。

④ 吴子良《笈窗续集序》，陈耆卿《笈窗集》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8册，第4页。

⑤ 黄震《黄氏日抄》卷六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8册，第590页。

⑥⑧ 《吕本中诗集笺注》卷二〇《送范子仪将漕湖北》其三，第4册，第1314页。

⑦ 《吕本中诗集笺注》卷一三《送常子正赴召》其一，第3册，第858页。

⑨ 吕祖谦著，黄灵庚点校《东莱吕太史文集》卷八《祭林宗丞文》，《吕祖谦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册，第133页。

⑩ 吕祖谦《关键·总论看文字及作文法》，《续增历代奏议丽泽集文》附录，《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4册，第7b叶。以下简称《关键》。

⑪ 《丽泽论说集录》卷六，《吕祖谦全集》，第2册，第154页。

⑫ 《丽泽论说集录》卷一〇，《吕祖谦全集》，第2册，第254页。

先经后史，最后及于“西汉书、杜子美诗、韩退之、柳子厚文”<sup>①</sup>，令子弟“看一经一史为常课，而以诗文之类为余课”<sup>②</sup>。陆九渊亦称其“属思纤余，摘辞绮丽，少日文章，固其余事，颜、曾其学，伊、吕其志”<sup>③</sup>，可见其学问的次第本末。这种融会并存的取向难免招致朱熹的批评，尤其在苏轼文章上，二人有较大的分歧。乾道年间朱熹就曾向吕祖谦表达对《童蒙训》论文以苏黄为法的不满<sup>④</sup>。若从文章学的角度看，恰是吕本中、吕祖谦融会理学、文学的取向促使宋代文章学不受极端的作文害道说的挤压，持续发展。

在“作文工夫”上，吕祖谦首先引用吕本中“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遍考古人用意下句处”（《关键》，第2a叶）的说法，认同吕本中的典范选择，强调先从韩、柳、欧、苏等唐宋大家入门。《古文关键》选取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张耒等八家文，相比于吕本中提出的唐宋七家，只增加了张耒。诸家之中，吕祖谦尤重苏文，编有《三苏文粹》，其早年文章如《东莱博议》巧于立意，结构精妙，“出入苏氏父子波澜”<sup>⑤</sup>，这与吕本中尚苏文是一致的。学界认为《古文关键》对唐宋八大家古文经典的确立有重要影响，而这是在吕本中的启发下产生的。当然《古文关键》是应一时教学需要编成的，虽全选唐宋文，但并不代表吕祖谦忽视先秦西汉经典，他令内弟“读秦、汉、韩、柳、欧、曾文字”<sup>⑥</sup>，重视《左传》文法等即是明证。而其弟子楼昉所编《崇古文诀》更全面地展现了先秦西汉、唐宋大家的经典体系，其中当有吕祖谦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吕祖谦继承了吕本中对典范大家辩证的批评观，对他们作为范式的优点与不足多有揭示，如云“识人文字长处，复识短处”（《关键》，第1b叶），评柳文“当学他好处，当戒他雄辩”、苏文“当学他好处，当戒他不纯处”（《关键》，第4a、4b叶）等等，延续了吕本中“学古人文字，须得其短处”（《童蒙训》，第591页）的思想。

其次，吕祖谦归纳总结了一套解析范文法度的方法，并以评点的形式加以落实，形成具有系统性的文章评点法。这既是阅读之法，又是作文之法，也是阐释揭示法度的方法。他首先提出系统的“看文字法”，包括“第一看大概主张，第二看文势规模，第三看纲目关键，如何是主意首尾相应，如何是一篇铺叙次第，如何是抑扬开合处。第四看警策句法，如何是一篇警策，如何是下句下字有力处”<sup>⑦</sup>等等。即先把握主旨，次看整体的结构布局，再看各节段的纲目、承接转折等等，最后看警策句、句法、字法。这细化、深化了黄庭坚“观古人之规模”、吕本中“见文字体式”“考古人用意下句处”等思想。接着他使用评、点结合的形式，将“看文字法”落实到文本分析中。一方面以截符（┘）给文章划分段落，以长抹标示主意要语，以短抹标示起承转结等文脉转换处，以点标明句法、字法佳处；另一方面以题下总评概括文章总体的布置结构、艺术手法特点，以旁批结合点抹符号，随文阐明文章的法度妙处。这便形成了具有系统性、典范性的文章评点法。

黄庭坚、吕本中等已有重视结合具体文本讨论文章法度的取向，但似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表达方法和分析工具。虽然唐五代诗赋格等著作能够在示法方式上提供借鉴，如引诗例、句例以立格法，

① 《东莱吕太史文集》新增附录《吕集佚文》，《吕祖谦全集》，第1册，第870页。

②⑥ 《东莱吕太史文集》卷一〇《与内弟曾德宽》，《吕祖谦全集》，第1册，第502页。

③ 《东莱吕太史文集》附录卷二，《吕祖谦全集》，第1册，第767页。

④ 朱熹著，朱杰人等主编《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三三《答吕伯恭》，《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1册，第1429页。

⑤ 《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三一《与张敬夫书》，《朱子全书》，第21册，第1334页。关于《东莱博议》的文章特色，可参见慈波《东莱博议汇校评注》“前言”，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4—9页。

⑦ 吕祖谦《古文关键》卷上，第1册，第1a—1b叶。本文依据日本文化元年（1804）覆清徐树屏刊本，徐本据两宋刻翻刻。

但“古文法度隐而难喻”<sup>①</sup>，散文更加讲究全篇整体的结构方式，各部分之间的组合关系，以及字、句等局部修辞在整体中的作用。要详细揭示这些法度，非谋之全篇不可。而无论是范温继承黄庭坚的思路，采用贯讲大意结构的方式分析《原道》，还是吕本中采用摘句、摘段的方式揭示文法，都不足以细致、深入、直观、全面地揭示文章法度。这一困境在吕祖谦手上得到了解决。古文评点是一种可以充分细致展示文章整体法度与局部法度的手段和方法，亦可在很大程度上再现师生当面教学的细节性现场，所谓“不啻口讲手画以指示学者”<sup>②</sup>。

最后，吕祖谦的文法理论体系更加细致、完善。在一篇命意布局之法上，他注意文章的体制格法，主张先见文字体式，提出匡正格、感慨讥讽体、攻击辨诘体等等。从各节段间的组合之法上看，他指出铺叙间架、起承转结、抑扬操纵、节奏条理、曲折斡旋、首尾相应等法度，讲究“转处不假助语而自连接者为上”“一收一放须成文理”“每段结处必要紧切”（《关键》，第1b—2a叶）等等，评点中也对这些地方屡以揭示。而在句法、造语、字法等微观层面上，他既继承了吕本中讲究省字、省句的思想，如评欧阳修《上范司谏书》“省文”（《古文关键》卷上，第2册，第63b叶），评苏轼《晁错论》“须看省文法”（《古文关键》卷下，第3册，第32b叶）等等，又将江西诗派炼字炼句的精神移植到文法上。如引用《童蒙训》说警策部分，将警句视为文章之“眼”：“一篇中自有一篇眼，一段中自有一段眼，寻常警句是也。”（《关键》，第3b叶）并称“若铺叙间架，令新不陈，多警策句，则亦不缓”（《关键》，第2b叶），主张以警策句救行文之缓。而警策句、精妙句来源于精心的锻炼，故他以炼句、句法等语批点文章下句妙处，主张“句新而不怪”（《关键》，第5b叶）。又强调学习造语，做到新颖自然，“不要尘俗熟烂”（《关键》，第2a叶）。字法上，他评《潮州韩文公庙碑》“王公失其贵”一段“五个失字如破竹之势”，“必有不依形而立”一段“四不字亦有力”（《古文关键》卷下，第4册，第54a叶），欧阳修《春秋论》“名、实字是眼目”（《古文关键》卷上，第2册，第55b叶）等等，或着眼于下字准确有力，或强调通过字法增强、贯通文势，发挥眼目的作用。

总而言之，在文道关系、范本体系、文法理论体系、以评点揭示范本法度等方面，吕祖谦都充分发展了吕本中的思想，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文章学体系，且以《丽泽文说》《古文关键》等独立的文章学著述的形式呈现出来。不难看出北宋中期以来，黄庭坚等人已开始着意研求文章之学，但相关论述主要以口头和书信为载体，较为分散，吕本中则编录相关论述，形成《童蒙训》，但其内容又与道德教化、诗学教育等混为一体，至吕祖谦手中才形成专论文章的独立著述。从影响力和代表性上看，成书于乾道九年（1173）的《古文关键》是现存评点第一书，《丽泽文说》及《关键》也约成书于乾淳之际，是现存较早的语录体文话，它们虽比作于乾道六年（1170）的现存最早的论文专著《文则》略晚一些，影响力却远过之。原因在于：一方面吕祖谦身兼世家子弟、科举明星、理学名家、举业名师等多重身份，乾淳间成为士林领袖，举子后学也多师法其文章学著作，影响力不言而喻；另一方面，因便于学者领悟文法，《古文关键》选评结合的编选方法成为文章教学中流行的教材编写方式，开启了文章评点的先河。后续出现的《崇古文诀》《文髓》《文章轨范》等无不祖范其式。因此无论是从理论的成熟度，还是从著述的代表性、影响力上看，吕祖谦均可视为宋代文章学成立期的代表。

#### 四 “黄庭坚—吕本中—吕祖谦”传承谱系的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黄庭坚、吕本中、吕祖谦之间虽然缺少直接的师承关系，但无论从学缘关系，还是从

① 章学诚著，仓良修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二《文理》，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上册，第141页。

② 张云章《古文关键序》，《古文关键》卷首，第1册，第1b叶。

理论联系上看都存在一条明确可考的文章学传承谱系，体现了宋代文章学由北宋的酝酿、两宋之际的承传到南宋成立的历史过程，三人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当然在这一谱系中还有许多人承担了中介性角色，如范温、徐俯等山谷后学在黄庭坚与吕本中之间的作用，吕大器、林之奇等在吕本中与吕祖谦之间的中介作用等。通过师友间的不断讲习，这一谱系传承得以实现。而从三人各自的文章学发生场域看，师友传承讲习也是促使其文章学生成、发展、传播的重要动因。如黄庭坚的文章学主要在指导亲族（如四洪、徐俯等）、友人（如秦觏、潘大临等）及其他后学应举考试、文章创作中形成。吕本中《童蒙训》是其聚集故人及家族子弟授课的教材，吕祖谦《丽泽文说》《古文关键》更是家塾私课之本，用以指导学子文章尤其是时文的写作。这种讲习的本质是一种伴随文章写作、应举需求而生的文章学教育机制。它以传授后学文章写作方法为中心，带有私学、家学性质，表现为师弟子、亲属、朋友间的授受切磋，乃至家塾、私塾的训课讲习，即所谓“师友渊源，讲贯磨砢，口传心授”<sup>①</sup>。担当教师角色的一般是科举成功者或文坛名流，在文章尤其是时文写作上有独到的经验，受业者则主要是举子。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黄庭坚、吕本中、吕祖谦相继而起，传衍不绝，不断探索文章写作之法，推动着宋代文章学由最初零散的论说发展到专论文章的独立著述，形成内涵丰富的文章学理论体系，逐渐走向成熟成立。可见这一机制既是激发宋代文章学生成发展的重要动因，也是宋代文章学获得传衍推进的主要渠道之一。

这一传承谱系虽只是推动宋代文章学发展的谱系之一，但却有关键而重要的历史作用与意义。原因在于三人围绕着如何教导士子作文的共同议题，以探索一套适用的作文方法为共同目标，最终建构了一种新的文章学范式<sup>②</sup>，其内涵包括合理的文道观念、辩证的法度观、稳定的范本体系、丰富的文法理论体系、合适的求法示法手段和工具等，解决了宋代文章学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关键问题，标志着宋代文章学的成立。

这一范式首先恰当地处理了文与道的关系。唐宋古文革新以文体革新为手段，以复兴儒道为目的，道为本、文为末是其一贯的主张。然而出于救弊纠偏的考虑，韩愈、欧阳修等在教导后学时，往往有“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有德者必有言”等说法，过于注重形而上的、理念上的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不过多讲述具体的作文之法。在北宋中期科举以文章取士的背景下，这些说法对想提高作文能力的初学者来说未免悬义过高，难以取法。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理学渐渐兴起，士人群体因对道、文的理解与重视程度不同，出现分裂对立的趋势，洛蜀党争、程苏之争是其突出表现，较为极端的理学家如程颐便有“作文害道”说，重道废文，这显然也不符合学子仕进的现实需要。如此一来，如何对士人进行合适的文章学教育就成为一个问题。黄庭坚、吕本中、吕祖谦构建了一种更为融通的文道观念，既以心性德行的修养、以“圣学工夫”作为“文之根本”，又认为“文”是一种需要学习的“技”，别有法度、别有工夫。从而确立了“法度”的关键地位，肯定“作文工夫”的合法性，提出由工夫而悟入的学文路径，将关注点由道而技，由本转末，走上自觉探索文章法度的道路，并形成辩证的法度观。经过不断地探索，范式中的范本体系、文法理论体系、求法示法的手段和工具等逐渐形成。范本体系即远师先秦西汉而从唐宋大家入门，确立了一批经典的作家作品。文法理论体系则与范本体系紧密融合，以编选、评点为手段和方法，不断从范本中抽绎法度，形成包含篇法、章法、句法、字法等内容的文法理论体系。凡此皆开辟了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新境界。

① 王铨《四六话序》，王水照编《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册，第5页。

② 所谓“文章学范式”是指古代文章学中具有示范性、指导性的理论体系，包括为广大士人所认同的观念、共用的研究方法等等。范式理论的创始人托马斯·库恩认为范式在广义上指的是特定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全套信仰、价值、技术等，狭义上则指的是具有模型和范例作用的具体研究成果（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此处参考了其相关定义。

之所以能称之为范式，还在于它获得了后世士人群体的广泛认同，甚至产生域外回响。首先，他们所构建的文道关系因应了南宋以后帝制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文化环境，获得士人的普遍认同。一方面从南宋后期开始，理学逐渐官方化，被应用于科举取士，塑造着士人的思想；另一方面科举制度依旧重“文”（如八股文、策、论等文体），呈现出“以文取士”的面貌。在此情境下，“圣学工夫”与“作文工夫”、理学与文章之学融会并存的取向因符合士人仕进的现实需要而被广泛接受，极端的“作文害道”说反不甚行。如叶适继承吕祖谦的思想，“欲合周程、欧苏之裂”<sup>①</sup>，其徒陈耆卿作文“探周程之旨趣，贯欧曾之脉络”<sup>②</sup>。理学家魏了翁也以“程、张之问学而发以欧、苏之体法”<sup>③</sup>，元初理学家陈栎则主张“由韩柳欧苏词章之文，进而粹之以周程张朱理学之文也”<sup>④</sup>。清代方苞则提出“义法说”，“义”为“言有物”，“法”为“言有序”，儒学、理学即是“物”的内涵之一，其立身目标便是“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sup>⑤</sup>，显然也有将文章之学与义理之学融会的倾向。一脉相承，姚鼐便主张义理、考证、词章相济为用。凡此皆可看出吕本中、吕祖谦等人理学与文学融会并存思想的影响。这有益于文章学在理学语境下谋求自身的合法性地位，持续发展。

其次，法度观念的凸显、“工夫一悟入”论的提出，使得即便文法不似诗法那样明确，士人仍然相信作文是可以也必须通过循序渐进学习法度、苦下工夫而掌握的技能，并非全由神秘的天赋，所谓“未有无法度而可以言文者”<sup>⑥</sup>。孟子“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sup>⑦</sup>的古训也被翻案，巧寓于法、舍法无巧即是一种典型观念。如吴曾祺云“法者，如规矩绳尺，工师所借以集事者也。无法，则虽有般输之能，无所用其巧。大抵文章一道，其妙处不可以教人；可以教人者，惟法而已。”<sup>⑧</sup>赵吉士则说“所谓法者，规矩准绳之谓，而巧即寓乎其中。”<sup>⑨</sup>对法度的自觉探讨遂成为中国古代文章学的主要内容，明清文法理论在宋人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字句、声音、神、气等角度展开讨论，更为丰富、深入、细密。而辨证的法度观也为明清文论家讨论有法与无法、死法与活法问题提供了参考。如薛福成说“古人文章可告人者惟法耳。然不得其神而徒守其法，则死法而已。”<sup>⑩</sup>学者以法度接引初学，而追求“其终也几且不知有法而未始戾乎法”<sup>⑪</sup>。

再次，黄庭坚、吕本中、吕祖谦所划定的囊括先秦两汉文、唐宋大家文在内的范本体系在后世虽有修正，但又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章经典体系。即便是理学家朱熹也认为“今日要做好文者，但读《史》《汉》韩柳而不能，便请斩取老僧头去”<sup>⑫</sup>，令儿子于“韩、欧、曾、苏之文滂沛明白者，捡数十篇”<sup>⑬</sup>抄写背诵。南宋后期周应龙编《文髓》则取韩、柳、欧、苏洵、苏轼之文作为法式。而自明代朱右编《唐宋六家文衡》、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抄》，到清代储欣编《唐

① 刘埙《隐居通议》卷二，《丛书集成初编》，第212册，第17页。

② 吴子良《赏窗集续集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8册，第88页。

③ 吴渊《鹤山集序》，《全宋文》卷七六八六，第334册，第25页。

④ 陈栎《太极图说序》，《全元文》卷五七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8册，第115—116页。

⑤ 王兆符《望溪文集序》引方苞语，见《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下册，第906—907页。

⑥ 倪士毅《作义要诀》，《历代文话》，第2册，第1499页。

⑦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一四《尽心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5页。

⑧ 吴曾祺《涵芬楼文谈》，《历代文话》，第7册，第6578页。

⑨ 赵吉士《万青阁文训》，《历代文话》，第4册，第3311页。

⑩ 薛福成《论文集要》卷二，《历代文话》，第6册，第5790页。

⑪ 吴德旋《七家文钞后序》引述姚鼐语，《初月楼文钞》卷五，《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0页。

⑫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论文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册，第3321页。

⑬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四《答蔡季通》，《朱子全书》，第22册，第1992页。

宋十家文全集录》、沈德潜编《唐宋八家文读本》，“唐宋八大家”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文章的典范。这些选家也希望读者能从唐宋大家文入门，上追先秦两汉。而“文必秦汉”之说虽对范本体系有所调整，但亦有相合之处。

最后，吕祖谦的古文编选评点法为后人提供了阐释、学习法度的方法和手段。此法虽受到不少非议，但此后无论士人自行揣摩文法，还是老师教授文法，大都热衷于采用《古文关键》所提供的范式，即抄选范文，以评点探究法度。这使得文法观念通过教与学自然渗透到士人思想深处。如元代理学家程端礼推荐的学文方法就是抄选批点韩愈文，熟读成诵，而后看其主意纲领，“次看其叙述、抑扬、轻重、运意、转换、演证、开阖、关键、首腹、结末、详略、浅深、次序，既于大段中看篇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sup>①</sup>，思路方法完全依从《古文关键》。明清大多文章评选本如《唐宋八大家文抄》《古文约选》《古文辞类纂》等主要、直接的编纂目的仍是以编选、评点的形式揭示、传授作文之法。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文章学范式在东亚汉字文化圈也有广泛的影响，成为异域文人学习文章写作的重要指南。如日本在室町、江户、明治时代一直盛行着《古文关键》《文章轨范》《古文真宝后集》《唐宋八家文读本》等文章评选本。乃至到了明治时代三岛中洲仍以《文章轨范》授徒，其讲习方法为“先明示一篇主旨，而段落，而枝节，而字句，以及抑扬、照应、断续、起结等之法。自大入小，自粗及精，顺次解释，务使之知作文蹊径。”<sup>②</sup>这与吕祖谦评点法完全一致。龟谷省轩编小学教材，亦认为明示段落乃文法之关键，汉文中有字法、句法、章法、篇法，求文章之法，要溯源至汉文<sup>③</sup>。而岛田重礼为其作序时依然重拾有法、无法的话头：“文之有法，犹方圆之于规矩，未有释此而能作者也。……然大匠与人规矩而不能使人巧，要在学者之何如耳。”（《育英文范序》，第1册，第1a—1b叶）可见，这一范式已从中土流传到东亚其他地区，塑造着东亚知识人的文章学观念与文章创作。

【作者简介】李由，女，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发表过论文《商业化运作与南宋古文评点的演变》等。

（责任编辑 刘京臣）

① 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卷二，《丛书集成初编》，第59册，第16页。

② 三岛中洲《初学文章轨范引》，东京文学社明治十九年（1886）版，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第1册，第1a—1b叶。

③ 龟谷省轩《育英文范》“例言”，东京光风社明治十年（1877）版，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第1册，第1b叶。原文系日语。